



长沙

肆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经济重心南移，湖南成为八大财赋地区之一，地位举足轻重。

元和年间(806—820年)，吕温谪贬道州刺史，后徙衡州，甚有政声，世称“吕衡州”。因长年在湖湘为官，吕温深谙湖南，作文阐述地理之独特性：“湖中七郡，罗压上游，右振防蛮，左驰瓯越，控交广之户牖，扼吴之咽喉，翼张四隅，襟束万里，天下之安危系焉。”

尽管湖南地位重要，然而，潭州人口不升反降，所辖69个乡由开元年间(713—741年)的21800户减少至元和年间的15444户。这一现象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有一段时期，不管是贬是擢，都是派来贤人、能人治理潭州。

从战国至西汉，长沙之城就呈东西长、南北窄之状，经历了东汉、三国、两晋、南朝后，长沙城有了逐渐向南北方向延伸的趋势，但这些扩充只是为了建造郡治、县治、津城等建筑需要而单向扩张，城市主体依旧没有多少改变，大致还停留在秦汉时期的样范。

“暮楼空”，潭州之城仿佛蒙上了一层悲怨忧愤的色彩，“言既不对酒，又不摊书，只是凭高俯望”，字里行间莫不充满了诗人对时局的不满，暗示之中却又含而不露地表达出诗人的襟怀。

“然而心如秋满月，眼若青莲花，一任空楼无端，偏是万端齐起。于是而泪色浅深，怨歌重叠，心同弹同，自哭自笑。”友人不至，当然无法同醉以解愁怀，伤今之情便如暮色一般铺展开来。

一首《潭州》，影影绰绰，似隐还现，曳出了晚唐的风雨飘摇。

乾符六年(879年)秋，10万黄巢大军从广州大举北上，一举拿下桂州。休整期间，黄巢督军打造数千木筏，溯桂水(漓江)，经灵渠进入湘江，洗劫永州、衡州，锋不可当，犹如天降奇兵，直抵潭州城下。此时，中唐时期的名将李晟之曾孙李系担负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旧唐书》言李系曰：“有口才而实无勇略。”

“黄巢之用兵，可谓极飘忽之致。”李系手下虽有5万精兵和数万团练武装，见到黄巢阵仗，被吓得龟缩在城中不敢主动迎战。可黄巢没那么多耐心，黑压压的大军蜂拥从湘江杀上来，直接攻城。黄巢先用乌云般的箭雨压制城头唐军，再架云梯飞跃攀城，一阵猛冲猛打，唐军不敌，城破即亡，被砍掉一只手臂的李系趁着夜色，仓皇逃往朗州(常德)。

潭州城破，黄巢纵兵屠城，困在城内的人马悉数被杀戮殆尽。黄巢号令手下将唐军将士尸体集中抛入湘江，顷刻之间，尸骸蔽江，水色猩红。

黄巢大军一过，潭州繁盛不再，日趋凋敝。

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刺史“堪养百姓”，“治人之本，莫如刺史最重”。不管刺史多么重要，却是一个充满矛盾与魔幻色彩的职位。可以说，整个唐朝，刺史既是地方行政的“全能管家”，又是中央集权的“神经末梢”；既能造福一方百姓，也能折腾出一片混乱；既能成就青史留名的翩翩诗人，也能闹出令人捧腹的各色幽默……

《唐刺史考全编》考据，自武德四年(619年)长沙归入唐朝，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包含多种授任类型，286年间共有98人刺潭州，其中，多数兼任了湖南观察史。

开成五年(840年)九月，尚书右丞(宰相)杨嗣复被调出朝廷刺潭州兼湖南观察使。闷闷不得志的杨嗣复虽在潭州没有什么建树，却因为一次善举，给长沙添了一抹诗意。

次年，杨嗣复府衙里来了一位青年才俊，他就是晚唐诗歌高峰李商隐。本来，杨嗣复欲给李商隐安排一个幕府职位，使其结束漂零，生活安定。化作弄人，杨嗣复正欲帮助李商隐，却传来一道圣谕，再贬为潮州刺史，限期启程。杨嗣复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匆忙离别，空留下形单影只的李商隐在潭州街头默然流浪。

黄昏日落，暮色渐浓，心情晦暗的李商隐独自登楼。临眺潭州之

武

纠正此错误认知，张谓以潭州刺史的身份，撰写了一篇《长沙土风碑铭》。是文以考证长沙风土为核心，结合地理志与史传笔法，记述长沙山川形胜、物产风俗及历代忠贞人物事迹，驳正了人们对长沙气候的讹传：“大抵卑湿修短，疠疾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脆之人，乡无斑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燠曠之日，冬无凜冽之气，传者之差也……”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高适一首《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说明，长沙几乎成了唐朝被贬官员的归宿。唐宪宗李纯曾作《贬崔群潭州刺史记》曰：“宜罢印於中枢，俾报政於外服。优以显秩，尔其勉之。可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勋赐如故。”

天宝十三年(754年)，苏师道谪放潭州刺史，此刻，潭州正遭旱灾，“民不聊生，死者相枕”。苏师道还没摸清府邸的门道，赶紧骑马巡察灾情。当他来到攸县司空山时，顺道造访了“光石山书院”遗址，并撰写《司空山记》：“江南攸邑，为地最僻，有司空山，县四十五里，当南岳之东隅，连云阳之福地，振潇湘之胜境……”这一记述，将中国书院始创于唐朝开元六年(718年)的说法，提前到了南齐末年(498—500年)。

苏师道在巡查灾情的同时，调出官仓存粮，动员富户捐献，“悉发而赈贫民，至是民间始获苏息”。因为此举，在清朝王先谦编撰的《湖南全省掌故备考》里，苏师道成了一位颇有功德的潭州刺史。

唐朝是一个诗人辈出的年代，翻看唐朝诗人的履历表，就会发现，其中很多人都有过充任刺史的经历，如张说、张九龄、岑参、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等。不少诗人在后世就以刺史代称，如岑参世称“岑嘉州”，韦应物世称“韦苏州”，柳宗元世称“柳柳州”。

“眼前一樽又长满，胸中万事如等闲。”大历二年(767年)，潭州破天荒有了一位非贬而来的刺史，诗人张谓从淮南田神功幕府脱颖而出，赏授潭州刺史。不过，张谓只是单纯的刺史，并未兼管其他州的军事。早在三年前，湖南从江南西道划出，设立了“湖南都团练守捉及观察处置使”，简称“湖南观察使”，这亦是“湖南”一名的首次出现。

湖南观察使下辖衡(州)、潭(州)、邵(州)、永(州)、道(州)共5州，治所位于衡州。张谓刺潭州，长沙第一次有了长沙诗人咏长沙：“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不用开书帙，偏宜上酒楼。故人京洛满，何日复同游？”张谓喜爱嗜酒简淡，乐意湖山。其诗“倜傥率真，不甚蕴藉，然胸中殊有浩落之趣”。

自贾谊始，世人皆知“长沙卑湿”。为了

参

“帆随湘转，望衡九面。”小船继续向衡阳进发，远眺仙气缥缈的衡山，杜甫不觉吟曰：“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生计艰难，前路渺茫，哪还有什么心思去寻幽觅古、探访衡山仙境？

真不凑巧，杜甫到达衡阳，才知韦之晋已接替张谓刺潭州而北上。一上一下，两条船在湘江之上交错而过。随同韦之晋刺潭州，朝廷也将湖南观察使徙治潭州，且辖区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郴州和连州，共领7州34县。

命运如风，谁可提前知晓？杜甫返棹长沙，韦之晋因病暴毙。这一突如其来的是噩耗对诗人的打击巨大，怅惋、悲恸的同时，吟诵了一首《哭韦大夫之晋》：“贞喜音容间，冯招疾病缠。南过骇仓卒，北思悄然绵……素车犹恸哭，宝剑欲高悬。”

大历四年七月，澧州(澧县)刺史崔瓘因政绩突出拔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制敕(皇帝诏令)曰：“银青光禄大夫前澧州刺史兼侍御史上柱国义丰县开国男崔瓘，尝守江潭，有清静简易之化，勤俭约己，精诚感物……自湘之东，制以连率，委之监郡，兼亦训戎。彼都之人，夙所爱慕，参领中宪，以绥一方。可使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团练守捉使及观察处置等使，仍兼充诸道营田副使知本管营田事，散官勋封如故。”

湖南观察使除统领考察辖区内各州县官吏的政绩以外，还掌管民政、财政，兼及军事，实际上是一方诸侯。崔瓘是杜甫母亲家的远亲，这让诗人找到了在长沙流连老子的充足理由。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许多事情发生与否，都难以预测，这也就是常说的世事难料。

崔瓘在澧州“政在简肃，恭守礼法”，“息贪官之豪夺，惩大姓之雄强”，深得朝廷信赖、倚重。然而，他却把管理澧州一隅的那套“以礼法绳将吏”之方法照搬到了潭州。这貌似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潭州的将吏远比澧州的将吏更强壮多了，自然也就豪横跋扈者居多，“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动辄起而倡乱，“逐帅杀帅，视为常事”。次年四月，对崔瓘所行“多不便之”，积怨日深的湖南兵马使陈玠骤然在夜晚举兵犯乱，可怜睡梦里的崔瓘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冲进府邸的乱兵所戮。

待到夜半，战火已烧到湘江边，慌乱之中，杜甫仓促解缆出城逃往衡阳。看着冰凉的江水，诗人心中莫不悲戚，痛吟了一首《入衡州》：“元恶迷是似，聚谋泄康庄。竟流帐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发中夜，烟尘淮水西。明朝上征去，相伴醉如泥。”事后，叛军吹灯拔蜡，“江汉倚(李)皋为固”。

经过李皋之治，潭州恢复了元气，社会安定，经济活跃。这以后，仍然多为文官出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如赵憬、裴胄、李巽、崔胤、韦贯之等贤良之士，他们大多能够做到为人清廉，“选贤、节用、薄赋敛、宽刑罚”，勤于政事、关切民瘼。

《唐刺史考全编》考据，自武德四年(619年)长沙归入唐朝，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包含多种授任类型，286年间共有98人刺潭州，其中，多数兼任了湖南观察史。在98位刺史的治理下，唐朝潭州有过清亮，也有过浑浊，有过激荡，也有过劫难。有些不易，但最终还是走向了下一个辉煌……

插画：何朝霞

长沙归入唐朝，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包含多种授任类型，286年间共有98人刺潭州，其中，多数兼任了湖南观察史。在98位刺史的治理下，唐朝潭州有过清亮，也有过浑浊，有过激荡，也有过劫难。有些不易，但最终还是走向了下一个辉煌……

为都督府，因只统管潭(州)、衡(州)、永(州)、郴(州)等8州军事，潭州总管府改为都督府，其职通常为潭州刺史兼任。

这个阶段，潭州都督大体均为王公贵族和武将担任，贞观十年(636年)，李世民第三子、蜀王李恪即任潭州刺史兼都督。褚遂良贬逐潭州刺史兼都督，打破了王公贵族和武将经略长沙和湘潭的格局。

褚遂良一到长沙，就被蒲州(永济)刺史崔玄玄给莫名其妙地参了一本，污其“玩忽懈怠不问政事，致使地方强盗横行”，恳求朝廷弹劾。蒲州在今山西，距离潭州遥隔千里，何以晓知潭州之事？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武皇后心中潜浮不散的恨意在作祟。

朝廷收到褚遂良的“黑材料”后，诏令韩瑗、来济两位宰相查证。不久，两位宰相就查了个水落石出，事情是这样的：褚遂良刚刺潭州时，长沙遭遇了水灾，一些饿殍家属因痛恨赈灾分配不公借故举事。这非像崔玄玄所说的“强盗横行”，况且，此事发生在新旧刺史交替之际，若要追责，当属前任之事，与褚遂良没啥关联。

好在两位宰相执事还算公允，褚遂良有惊无险。

现今人们很少知道褚遂良的政绩，倒是对其传世墨迹《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书法作品津津乐道。“书绝伦”的褚遂良到底问不问潭州政事？史书不见披露。不过，褚遂良喜好在民间巡视，这是否说明他因放逐而移情山水？除了他自己，外人怎能说得清楚。

清朝同治《湘乡县志》载：“褚遂良行湘邑，去治所北数百步，有感应寺。寺侧有池，公临池上，宴集赋诗，常洗笔于池，有浮云滃然，人异之。”宋时，潭州治下的湘乡县令邵自信偏好书法，将感应寺前的水池命名为“洗笔池”，褚遂良下榻的地方改为“褚公祠”。

早在晋朝，湘潭壶山就建有名刹石头寺，褚遂良刺潭州时，正值刘禹锡《智严大师碑铭》里赞其“星月丽天，珠玑同贯。由其门者，皆正法焉”的高僧智严驻锡该寺。智严似乎懂得褚遂良的心思，常邀他入寺品茶参禅。忽然一天，壶山云遮雾罩。当浓雾被太阳撕开一道口子时，褚遂良一人在山中面对立，热泪滚落而下。见此，智严赶紧奉上笔墨，褚遂良挥笔悲愤地写下“大唐兴寺”四字。

“大唐兴寺”手迹石刻碑额现存湘潭市博物馆，其字秉持了褚遂良晚年书法作品骨气深稳，清远萧散的一贯风格。喜得褚遂良之字，冯绍真感叹不已，将它改名为“洗笔池”，褚遂良下榻的地方改为“褚公祠”。

这本来是一个人间美谈，可总有一些人似猎犬，能从中嗅出异味。当佞臣许敬宗听说这件事时，褚遂良已于前一年调任桂州(桂林)刺史。逮到这等好机会，当年坚决支持封武昭仪为后的许敬宗岂可放过政敌？他屁颠屁颠地跑到武则天那里奏了一道，妄说褚遂良在担任潭州刺史时与韩瑗、来济暗通款曲，“图谋不轨”，证据就是山中雾散书写“大唐兴寺”四字“寄寓了抑武(则天)兴唐之望”！

褚遂良百口莫辩，被再贬爱州(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拥有“率直鞭亮人品和道媚飘逸书品”的褚遂良在爱州忧闷、孤愤而逝，享年63岁。直到唐懿宗年间(873—883年)，方获准其后裔奉祀。褚遂良莫辩，被再贬爱州(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拥有“率直鞭亮人品和道媚飘逸书品”的褚遂良在爱州忧闷、孤愤而逝，享年63岁。直到唐懿宗年间(873—883年)，方获准其后裔奉祀。

唐朝初期，将全国划分为300多个州，各州的长官均叫刺史。将职务与州名结合，简称刺某州，例如，白居易外放苏州刺史，简称刺苏州。武德四年，朝廷置带军事性质的总管府，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总管兼任驻地之州刺史。是年，赵郡王李孝恭、行军总管李靖奉令征讨江南割据政权萧梁。削平萧梁后，置潭州总管府，李靖总管湖湘军队。三年后，朝廷将不满10州的总管府一律改

《唐刺史考全编》考据，自武德四年(619年)长沙归入唐朝，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唐朝灭亡，包含多种授任类型，286年间共有98人刺潭州，其中，多数兼任了湖南观察史。在98位刺史的治理下，唐朝潭州有过清亮，也有过浑浊，有过激荡，也有过劫难。有些不易，但最终还是走向了下一个辉煌……

刺潭州

范亚湘

文脉长沙

范

亚

湘

文

脉

长

沙